

# 屋舍·门户·窗栏·舟船

蔡小容

《儒林外史》连环画有多个版本，上美社的十一册本不仅是收藏品，它依然在不断再版畅销。这套书 1955 年由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初版，赵三岛、李铁生、冯墨农等老辈连环画家绘制，画风扎实、拙朴，与上美社的镇社之宝《三国演义》一脉相承，只是一文一武。不同分册的绘画，风格齐整，水准整齐，不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解放后这些“连环画一百单八将”共同收编进入国营美术出版社，担任“连环画创作员”，接受分配任务，集体创作，但他们在达到了规范性的同时，各自作品中的灵气与奇思妙想，都保存着。

我看这套书，最喜欢看它画里的屋舍、门户、窗栏、舟船，真是非常的好看！不光是我，书中的人也同样觉得它们好看。在画中看景的有穷儒周进。他六十多岁了，还没有考中秀才，应聘到一个叫薛家集的乡村当教书先生，薪酬很低，教的孩子又顽劣，学生家长又势利。在这种苦闷的境地中，也偶有怡人的一刻，原著是这样写的：

周进吃过午饭，开了后门出来，到河沿上望望。虽是乡村地方，河边却也有几株桃花柳树，红红绿绿，间杂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。周进见下雨，转入门内，望着雨下在河里，烟岚远树，景致更妙。

连环画略作修改：“周进吃过午饭，见外边下着蒙蒙细雨，就开了后门欣赏雨景。”——这么一改，显得周进更要看这雨景了，穷酸、迂讷的老儒生，心里还存有一方审美空间，他打开后门，这方空间就呈现于眼前：河边、柳树、花朵、青草，雨画着斜线，河面上一个一个小涟漪。他站在门边，门框里的图景让他的心境开阔起来，远处青山隐隐，像他一直模糊向往着的某处。雨下大了。河的上游冒雨摇来一只芦篷船，到了岸边，下来一个乡绅模样的人，一个仆人相陪，另一个仆从船上挑了好大的两个食盒下船。雨势不小，乡绅举起草子遮雨，从船的那头看过去，雨线斜扫，岸上的树被扫得线条疏淡了，近处头顶上的树叶仍清晰浓密，站在岸上门里的周进，人很小，他的悠远抽象的思绪被这具体的人占领了。周进寄宿的地方是个和尚庵，来避雨的乡绅是位举人。周进陪他坐着说话，到了掌灯时分，举人叫和尚烧了些饭，他的仆人给他打开食盒，把酒菜摆满一桌子。他并不邀请周进，周进也就兴趣地退到隔壁房里。和尚送来他的饭食：一碟老菜叶，一壶热水，他搬到学生的小桌子上吃。一门之隔，我们从门里看见举人正握箸大嚼，微仰着头在嚼鸡腿，正要出另一个门的和尚，回头看了一眼他满桌的鸡鸭鱼肉，这一眼不无意味，也让图中有气息流动。这幅图里，门的布局很妙，分处两间房的两位儒士，相背而坐，给我们看见的是扶着他那碗饭的周进的神情。举人的言语动静，必在他耳朵里，而他这乡村穷塾师，哪会在举人的眼睛里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·窗栏》中写道：“开窗莫妙于借景。”门、窗，在画中也是巧妙取景之法，周进教书的一幅就很典型。他教的那些孩子，都非常淘气，一时照顾不到，就溜到外边去拍球、丢石子、捉迷藏，我们从画上的两扇窗户里就看见他们在屋外这样玩，类似古时常作的《婴戏图》，颇喜庆，可惜的是在该读书的时候。屋里的周先生，管束不了，灰心低头捋自己胡须，几张小桌上的笔墨书本，徒然摊开着。周先生不久就被辞退了。

《匡秀才》里也有隔窗取景图。匡超人考中了秀才，消息传回他乡下家里时，他那个大哥正在被人打，为的是在集市上摆摊争位子。打得凶，我们从画上看到一个手持大棒的人把匡大追打进了门，躺在床上匡老爹吃惊地欠起身。

《文汇报》高级编辑施宣圆先生逝世一年多了。家乡福建泉州以及晋江、石狮的亲朋好友为了表彰他对家乡发展建设的贡献，寄托怀念之情，集体出资为他编印了一本纪念文集，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，邀请海内外嘉宾数百人出席。我因与施宣圆同学同事多年，有幸获邀参加。首发仪式在福建泉州石狮市万佳酒店举行，规模盛大，气氛热烈。

我与施宣圆相识多年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和编辑。他从 1965 年进文汇报工作，五十多年中勤恳工作，无私奉献，成绩卓著，是一个记者型的专家和专家型的记者。他的新闻作品曾多次荣获上海和全国好新闻奖。他担任文汇报“学林”专刊主编十多年，在全国新闻界、史学界享有盛誉。他还醉心于史学研究，编著出版的历史、新闻类著作十多种，他主编的《千古之谜——中国文化 500 疑案》《千古之谜——世界文化 500 疑案》荣获全国图书“金钥匙”奖一等奖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施宣圆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阳光、乐观、热情、坦

有人打架，自然就有人看，床边窗户是个方洞，露出几个乡人，他们一路跟了过来，跟到这里，目光随之拐弯，匡大两个进了门，乡人们从窗口接着看这室内好戏。匡大嚷：“我家老二同县老老爷有交情，我怕你么？”揪住他衣领，要拉他见官，匡老爹劝阻。正吵闹，两个穿公门衣服的人拿着大红帖子进门，恭喜二相公高中。拿大棒的人顿时软了，匡大硬了，胜负已分，那人退走。再下一幅，匡超人回家，在床前对着父母下拜，他高中的红帖贴在床头，窗口里几个乡亲，荷着锄头，抱着娃，欣羡地望着窗内的一幕，乡里保正正进门贺喜。

吴敬梓原籍安徽，三十三岁时移居南京。《儒林外史》以南京为主要的故事背景，也写到了苏州、扬州、温州、嘉兴等地。就地域这一点，沪上老画家们有着天然优势，他们的籍贯大都在江浙一带，赵三岛是江苏吴县，钱笑呆是江苏阜宁，陈履平是江苏盐城，李铁生是江苏江宁，林雪岩是江苏扬州，冯墨农是浙江嘉兴。江南风物他们自小熟悉，化于胸中，现于笔端。江南水系发达，出行多靠船只，反映到画里，也是河多、船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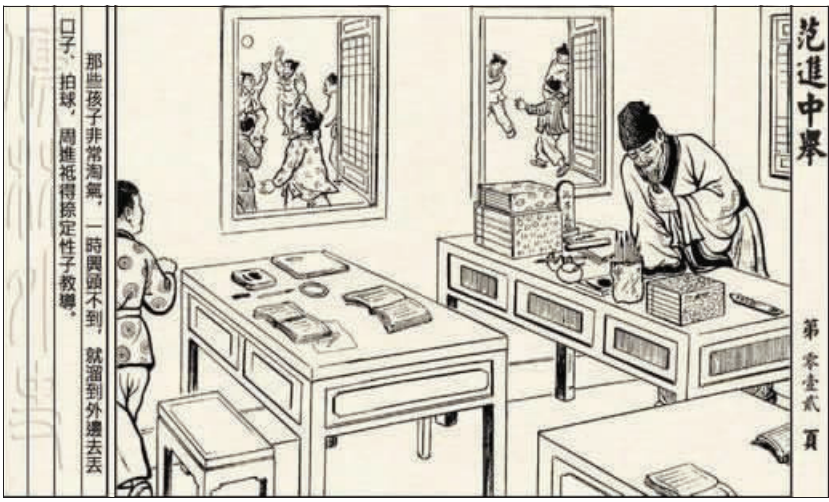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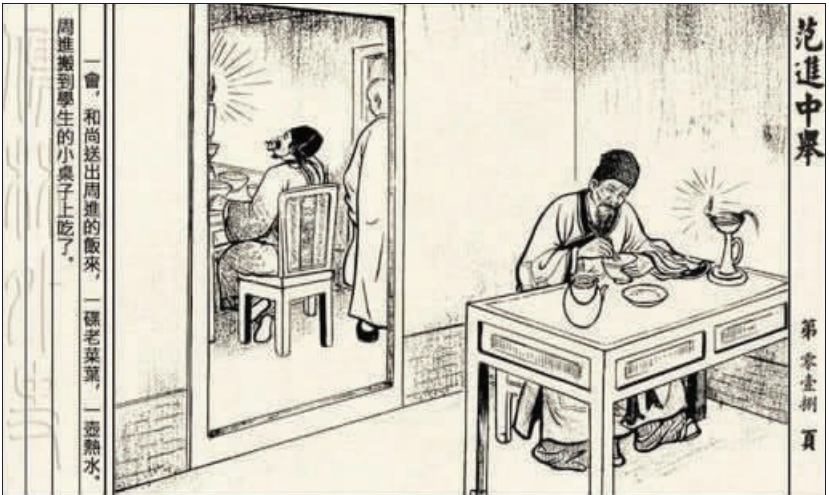
凤四老爹替朋友打抱不平，要上嘉兴去。他们到码头搭船，河埠上热闹繁忙，河上竖着许多船桅舟楫。岸上的景色则疏朗鲜明，树的枝干伸展在天空，行人走在路上，走在桥上。古人画山水有一句口诀：“丈山尺树，寸马豆人。”在这里，则因地制宜了，人物为主，树也很突出，山、河、船是背景，比例较小，画面效果峭拔而生动。

沈琼枝逃出盐商的家，在东方渐渐发白的时分上了一艘小船，在途中打定主意，船到仪征，她下船去换江船到南京。她上岸了，我们随船夫的目光看她立在岸上，姿态里显出骄傲，她身后是城门，人来人往，我们也不觉精神一振！天已大亮了，一个陌生的新地方，前面还有更大的新地方，许多的生机等她去开创。船夫对她挥挥手——保重呀，姑娘，祝你前途好运。

假名士牛玉圃和牛浦，要到扬州去投奔盐商，中途逆风，船也是在仪征停泊。牛玉圃对牛浦说：“这里有个大观

楼，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去吃素食罢。”牛浦就跟他上岸。我们在船的这头看他俩上岸，这头正在停船、系缆绳的船夫们，目光也跟随他俩，这幅画就有了焦点。但这幅画吸引人的的是它描绘的背景：岸上一溜店铺，都是现在见不到的老房子，线条淡淡，但瓦片密密的，窗户一格一格的，铺子里外的人在做各种营生，撑船打铁，挑担扛包，也有摇扇闲走的，河边有老妇在洗衣。1950 年代画出这些画的老画家们，对这些屋舍门面再熟悉不过，那时候的街和房子，就是这样的。老房子都旧了；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老房子几乎拆光了，连新房子都已拆了好多茬，没有房子会老了的。

大观楼是个大酒楼。牛玉圃和牛浦上了楼，楼上地方宽敞，摆设齐整，木楼梯，木地板，一张张大方桌上摆着筷筒，一长排木窗全部朝外打开。虽然没有一幅图画出了窗外的景色，可是这留白引人遐思，我觉得窗外就是江。临窗坐着，可以看江水，可以看江对岸的房屋。《水浒传》里，我很爱宋江在浔阳楼那一段，有景物，有心情——宋江在江州酒楼上独饮，对着一派江景，临风触目，感慨伤怀。书中未写当时天气，我补白，应是天阴的黄昏时分，云阔天低，江风猎猎。但《儒林》这里，是个晴天，牛氏二人没有宋江的情怀，他俩心情甚佳，船停泊，上岸吃顿饭，在酒楼上还碰到个牛玉圃的熟人。“原来是老哥！”“原来是老弟！”原著写下如此对白，不动声色地白描，连环画一字不差地放在图画中对白的框里，改编者想必是充分领略了其中幽默。牛玉圃向牛浦介绍，说这是曾与他在衙门里共事的王义安先生，让他听见。这王义安长着一个酒糟鼻，吃饭时把一条腿搁在长板凳上——这是画家的创作，原著没有写，画家也是阅人多矣，这外貌动作设计得神气活现。三人吃着饭，牛玉圃和王义安一唱一和地吹嘘他俩的过往，把个牛浦听得呆呆的。正说得稠密，不料楼梯上又上来两个衣服破烂的秀才，看到他们，一个就说：“这不是丰家巷蔡子家掌柜的乌袍王义安！”另一个说：“怎么不是，他怎敢头戴方巾，冒充秀才！”两



## 浓浓的乡情

贾树枚

率的个性。虽然他操着一口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，让人听起来有点费力，但他的热心、善良、爱好交际、乐于助人 的性格，让他善于和各色人等打成一片，在各行各业交了很多好朋友。我曾以为他大概是在一个非常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养成了这样可亲、可爱的性格。其实不然。

这次参加首发仪式，了解了他的家世，让我看到了施宣圆的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——他对故乡的深情。

据施宣圆的夫人包明廉等亲友相告，施宣圆 1941 年出生在闽南晋江市龙湖埔头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年幼时父母因突发的疫病撒手人寰，以致成年后的施宣圆对父母几乎没留下

什么印象。晋江自古人多地少，资源贫乏，迫于生存的压力，自唐代以来，人们多到海外谋生。失去父母后身陷贫困的童年，似乎没在施宣圆身上留下阴影。从童年到青年，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，哥哥、嫂嫂、姐姐、叔叔、婶婶、外婆以至亲友邻居都关注着他的成长，让他沐浴在整个家族的爱河之中。哥哥嫂嫂尽最大努力呵护这个小小弟弟，长施宣圆 14 岁却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，像母亲一样照顾施宣圆，支持他读完小学，又考上当地著名的南桥中学。每逢寒暑假，外婆就把施宣圆接去，让他和表兄弟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叔叔婶婶也常把家中的食物分给施宣圆吃。三年困难时期，身处海外的舅

舅舅妈给施宣圆寄来猪油花生罐头，为他增加营养。在他们的支持鼓励下，施宣圆中学毕业，又考上全国名校复旦大学，毕业后成了文汇报高级记者和编辑，为家乡父老增光添彩。饮水思源，施宣圆有着特别深厚的乡恋情结，尽了最大的努力回报家乡父老的厚爱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他撰写了大量文章、报道，发表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商报》《福建日报》《泉州晚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纸上，宣传家乡改革开放、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。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发挥自己在这几项研究方面的专长，向有关部门写报告，促进了石狮撤镇设市的进程。他倾注了大量心血，

尽管从好朋友颜延之的《陶征士诔》和文集编纂者萧统的《陶渊明传》，直至《宋书》《晋书》和《南史》等官修史籍，都叙述过陶渊明的生平经历，但对其家世背景却多有语焉不详的地方，尤其是其父亲的名号行迹，一概付之阙如。宋元以后出现的文献则对此众说纷纭，相继出现过陶回、陶逸、陶敏等不同说法，又称他曾经担任过姿城太守或安城太守。然而这些记载均来历不明，或于史籍无征，或与史传齟齬，令人难以采信。

要考察陶渊明父亲的相关情况，唯一可以放心依凭的资料，其实还是陶渊明本人在《命子》诗中所提到的“于皇仁孝，淡焉虚止。寄迹风云，冥兹愠喜”。近现代学者就多据此立论，如丁福保的《陶渊明诗注》在“寄迹风云”句下注云：“言身涉仕途也。”梁启超的《陶渊明年谱》说：“先生父名无考，此云‘寄迹风云’，知必尝仕宦。”古直的《陶靖节诗笺》则称：“靖节父不见于史，名爵无考。玩此诗意，盖尝为方镇参佐也。”廖仲安的《陶渊明》也同样认为，这几句是“说他父亲虽然曾经‘寄迹风云’（身入宦途），却能够‘冥兹愠喜’（无论官位升降得失，都无喜怒之色）”。尽管各家所述并没有牵强比附姿城太守一类的不实之词，却不约而同地都认为陶父曾经有过一段仕宦经历。究其原委，当与诗中“风云”一语息息相关，正如逯钦立在校注《陶渊明集》时所言，“古人常把当官叫作风云际会，本之《易经·乾卦》‘云从龙，风从虎’”。

以“风云”来喻指因应时势以建功立业，确实是汉魏以来屡见不鲜的习语，可是以此来诠释陶诗，却难免让人疑窦顿生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倘若真如上述诸家所推测的那样，陶父曾经出任任职，甚至位居方镇参佐，那么在注重家世门第和仕宦经历的晋宋时期，为什么那些早期传记资料对此避而不谈，其他史籍文献中也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可供追索呢？

其实“风云”一语本可径指自然风景，西汉枚乘在《柳赋》里形容柳树树枝叶繁茂，就说“出入风云，去来羽族”；东晋庾亮之的《山赞》描摹山中景致，有云“悬岩杳翳，神明依居。官府风云，怀吐川渠”；齐梁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刻画作家的想象之功，谓其“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”，都是典型的例证。由此风云之义，可与之同时并见。

《儒林外史》连环画，吴敬梓原著，上海新美术出版社 1955 年初版。《范进中举》，吕品绘；《凤四老爹》，陈履平绘；《沈琼枝》，钱笑呆绘；《盐商万雪斋》，赵三岛绘）

2017, 10, 5-7

## 陶渊明的父亲

杨焘

子遯世不闷，以德存身”，随即在第四章开篇就出现了“风云有作，应通山渊”的诗句；稍后牵秀的《王乔赤松颂》称赞王子乔、赤松子等仙人，说他们能够“齐迹风云，超远姿微”；东晋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·明本》中指斥俗世昏乱，“彼有道者，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，而翻尔藏轨于玄漠之际乎”；梁陈时徐陵的《山斋》中有“桃源惊住客”、“宁辨汉将秦”数句，显而易见源出于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而诗中又提到“复有风云处，萧条无俗人”。有时即使将“风”“云”二字分拆开来，仍然能够表达同样的意思，范晔的《后汉书·逸民传赞》就曾以“远性风疏，逸情云上”来概括隐士们的超脱性情。依照这样的理解再来仔细推敲陶渊明所说的“寄迹风云，冥兹愠喜”，恐怕是指其父淡泊名利而无意仕途，甘愿隐逸于乡野山林，由此也就混灭了各种喜怒之情。陶渊明在《祭从弟敬远文》中提到自己和从弟两人，“父则同生，母则从母，相及齔齔，并罹偏咎”。据古直在《陶靖节年谱》中考证，“父母分举，正谓已暨年丧父，敬远向齔丧母耳”，可以推知其父在陶渊明十二岁左右就已去世，因而在早期各类文献中名姓不彰，事迹无考，也就情有可原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对于父亲的嘉言懿行，陶渊明依然记忆犹新，否则也不会在《命子》诗中留下那样的追忆了。他日后之所以会有弃官归隐的决定，想来或多或少也受到父亲立身处世的濡染熏陶。元人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在《命子》篇末引赵景山的评论，虽然感叹“靖节之父，史逸其名”，“其行事亦无从考见”，可与此同时又特别指出“其父子风规盖相类”，于此也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。

如果再作探究，还有一些事情也值得注意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载有陶渊明叔父陶淡的生平，说他离群索居，“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”，为了躲避州郡长官的征辟，最后竟然逃至深山之中，“终身不返，莫知所终”。而在陶淡传之后，紧接着就是陶渊明传，叔侄两人的行事也颇多相似，如前者“家累千金，僮客百数，淡终日端拱，曾不营问”，而后者则“不营生业，家务悉委之儿仆”。此外，陶渊明在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》中说自己“衰迹衡门下，邈与世相绝。顾盼莫谁知，荆扉昼长闭”，颇有孤高傲物的意味，但最后又郑重致词，“寄意一言外，兹契谁能别”，将从弟视为心意相通的知己。可惜敬远不幸早逝，陶渊明为此又撰《祭从弟敬远文》，着重表彰他“心遗得失，情不依世”的处世态度，又陈说他平日“绝粒委务，尝桑山阴”的生活方式和“晨采上药，夕闲素琴”的兴趣爱好，而两人志趣相投，以至“常愿携手，冀彼众议”，敬远无疑也是一位安贫乐道、遗世独立的隐士。由此可见，隐逸俨然已经成为陶氏家族世代承袭的风尚，这也是考察陶渊明仕隐观念时不容轻忽的一方面吧。

筆會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2018/3/11